



中國軍事變革之內部環境因素

副教授 王瑋琦

提 要

傳統上，中國在制訂國家安全相關政策時，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內、外在環境變化的影響。1949 年取得大陸政權的中共亦不例外。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便曾強調，要「借鑒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經驗，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①。」因此，探討具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內涵之前，有必要針對中國所處的內在環境進行分析。

前 言

在 David Easton 有關決策系統輸入項（input）的討論中，他認為對決策組織形成輸入性影響的有「支持」與「要求」兩項。這兩項變數既彰顯了組織存在的功能性，同時也是組織所賴以存在的基礎。以這樣的思路對照中共軍事決策組織，在仍然為黨的軍

隊而非國家軍隊的情況下，可以從中共黨組織執政合法性基礎角度加以探究^②。

儘管中國為一威權政治體制，但是除了武力維持外，仍須尋求人民的支持，以確保政治穩定，避免百姓大眾成為覆舟之水^③；根據吳玉山的研究指出，東歐及蘇聯共產政權瓦解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派系鬥爭過程中，為求勝利援引社會民間力量所致^④。江澤民

註① 「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密切關注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態勢 積極關心支持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華網，2003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5/24/content_885152.htm

註② 事實上，大陸學者劉亞瓊、何顯明、張娟與習裕軍等人在有關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中，便引用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作為探討的理論基礎。劉亞瓊，「轉型時期執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建構」，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第 29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18；何顯明，「意識型態的合法性詮釋功能及其限制」，現代哲學，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25；張娟、習裕軍，「政治合法性：內涵釐析與特徵初探」，天府新論，2007 年第 2 期，2007 年 2 月，頁 28-32。。

註③ 蔣新衛，「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初步探索」，湘潭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6。

註④ 參見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的「三個代表」^⑤，胡錦濤的「三個為民」^⑥也都清楚說明獲得人民認同以維續政權合法性越來越重要；更何況，在國共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三年內戰初期。共產黨必須憑藉人民的掩護與提供作戰所需情報與物資，方能躲過覆滅災厄，擊潰敵人進而掌握國家政權。至今，中國有時會引發危機或透過戰爭手段，鞏固國內政治地位，動員民眾支持其政權，以維持其政權合法性^⑦。因此，政權合法性可作為中國軍事變革的內部環境因素加以探討。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簡單說來，「合法性」是「符合法律的

東西」之意^⑧，至於所謂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根據 Lipset 的說法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成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⑨；根據張娟、王山峰、黃培與李偉等學者的研究，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變遷，大致可分為兩個歷程^⑩：（一）從 1949 年至 1956 年。中共合法性來源比較充裕，包括首先，國民黨政權專制腐敗，經濟上低效無能所造成的「負面合法性」資源，使得人民轉而支持共產黨^⑪；其次是意識型態資源，也就是由於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獲得越來越多人的信仰；三是「克里斯瑪」型權威資源，也就是對毛澤東人格魅力崇拜

註⑤ 三個代表就是：1. 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2. 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3. 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於 2001 年提出，隨後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三個代表的產生背景、過程與對中國大陸所造成的影響，可參見凌志軍，變化：「六四」至今的中國社會大脈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342-455。

註⑥ 2002 年 12 月胡錦濤赴西柏坡發表講話，強調勿忘毛澤東的「兩個務必」，並提出「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有關三個為民對中共政權掌握的意義，可參見寇健文，「2003 年中共政治：胡錦濤鞏固權力」，國關中心年度評估報告，2007 年 3 月 4 日擷取，網址：<http://iir.nccu.edu.tw/hpolicy/2003report/b03.htm>

註⑦ Mark Burles, Abram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RAND, 2000)pp.26-8.

註⑧ 讓－馬克·誇克，合法性與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年）頁 24。

註⑨ 李普賽特著，政治人——政治社會的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55。此一概念最早在 Plato 與 Aristotle 時代便已提出，在亞氏看來，政治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就是「在給定的前提下，一個政體起初是如何產生出來的，通過何種方式可以長時間地保持下去。」參見苗力田·亞里士多德，苗力田·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22。

註⑩ 張娟，「鄧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探微」，攀登雙月刊，第 25 卷第 4 期，總 147 期，2006 年 8 月，頁 35-6；黃培、李偉，「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歷史變遷與思考」，理論月刊，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6 月，頁 64-6；王山峰，同前註，頁 25-9。

註⑪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另可參閱祝天智，「合法性不足的弱勢獨裁：論國民黨的訓政統治」，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第 27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9-12。

所形成的「超凡魅力」合法性，也是 1976 年以前中共最重要的合法性資源；四是績效合法性資源，亦即中共掃除舊社會惡習與陋規，以及建國初期人均所得提升的政績所引發的社會支持；最後則是中共黨員幹部為人民服務的優良作風，受到人民愛戴與擁護所致。

(二)從 1957 年至 1976 年，這段期間由於左傾情形越來越嚴重，致使中國共產黨越來越依賴毛澤東「超凡魅力」式的合法性作為執政的基礎。陳永發甚至以「不斷革命」作為此一時期的總結標誌¹²。就在毛澤東如此意識型態與政治掛帥的前提主張下，北京自 1949 年起由於「非正常」因素死亡者數以億計，其中光是 1959 年起的「三年艱困時期」的死亡人數便高達 3 至 5 千萬人¹³。時間長達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讓中國政治、經濟

與社會幾乎處於崩潰邊緣，外交上除與葉門建交一事外，毫無任何建樹。更嚴重的是，由於政府威信的遭到顛覆與毛澤東政策最終受到質疑，使得北京政權以意識型態作為其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來源的穩固性開始動搖¹⁴。雖然在鄧小平的努力之下，中共政權合法性逐漸擴張與穩固，然目前中國正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會過渡的重大轉型時期，因社會轉型而引發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正衝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¹⁵，並產生包括主流意識型態整合功能遭到削弱、社會不公和不安定因素日益凸顯，以及對權力缺乏科學有效的監督和制約等合法性危機¹⁶。在這樣的情況下，重塑中共政治合法性基礎，成為其刻不容緩的挑戰，為此必須拓展合法性資源、建構新的合法性基礎，有效鞏固中共執政地

註¹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8。

註¹³ 現在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海外，大躍進都被廣泛地視為一場空前的經濟和人命災難。由於計畫部門使用誇大的資料，人力資源從農業被轉移至工業，使得中國的鄉村出現大量的死亡人數。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大陸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數是 2,158 萬人。東西方各方面的資料顯示死亡人數大約為 3,000 萬至 6,000 萬人，主要死因幾乎都是餓死。中國共產黨採用了非正常死亡 3,500 萬人，4,000 餘萬人口減少的數據，但根據很多海外學者及專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網上發表的文章的數據資料則非正常死亡數字有可能超過 5,000 萬。有關資料可參閱國務院，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199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 年）頁 355、384；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香港：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大躍進」，維基百科網站，2007 年 5 月 1 日擷取，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B7%83%E8%BF%9B>

註¹⁴ 夏道明、鄭立、陳標，「適時調整政策，鞏固黨的執政合法性」，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 年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7-9；張娟，「鄧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探微」，攀登雙月刊，第 25 卷第 4 期，總 147 期，2006 年 8 月，頁 35。

註¹⁵ 鄧衛文，「鄧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簡論」，理論界，2007 年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24。

註¹⁶ 雷青松、黃紅東，「執政合法性資源與黨的先進性建設」，理論探索，2006 年第 2 期，總 158 期，2006 年 2 月，頁 44-5。

位與能力¹⁷。為解決意識型態在鞏固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功能每下愈況困境，中共將經濟發展成就與民族主義兩項納入，作為支撐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¹⁸。

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由法國唯物論哲學家 Destatt de Tracy 所創的詞，原意在研究觀念和知識的起源、限制、演變、性質集其形成的法則¹⁹。總括來看，所謂「意識型態」就是指一套對於世界運作的特定觀點；其內容從最核心的宇宙的本體、運作的方式及變化的過程，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均涵蓋在內，形成一

套完整的體系。由此，意識型態基於對世界運作的認識，與對人類社會規律的探究結果，導引出生存其中的人類，特別是信仰該認識體系的團體或個人對事務的特定價值觀與態度，以及應有的相應行為²⁰。中共以馬列主義作為其發展的根基與行動的藍圖，因此意識型態對北京政權而言，始終攸關黨魂與政權實際存在與否的合法性來源。

中共軍隊是意識型態的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軍隊是大陸唯一能夠保證穩定秩序的武裝力量，不僅常常在不同派系鬥爭中，扮演著「判官」的吃重角色，「三支兩軍」政策的推動²¹，

註¹⁷ 劉亞瓊，「轉型時期執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建構」，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第 29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15。

註¹⁸ 對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以後所進行合法性基礎擴大範疇，學者有不同意見，基本上大陸學者都以經濟、意識型態與黨及幹部建設作為合法性來源，絕口不提「民族主義情緒」。不過，謝海軍曾在合法性探討文章中指出「中國近代以來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在現代文明基礎上的偉大復興。」並以此暗示共產黨的最大政績合法性，便是恢弘民族地位。西方學者也認為經濟、意識型態與民族主義情緒三者為合法性來源。本文參考中共政權實際作為，採用西方學者的說法。參見于學強，「論鄧小平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探索」，阿壩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42-5；危琦，「論鄧小平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的重構」，求實，2005 年第 11 期，2005 年 11 月，頁 7-10；謝海軍，「現代進程中執政合法性資源整合的變遷」，求實，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11。

註¹⁹ 黃筱薌，中共意識型態之演變與運作研究（台北：俄情研究雜誌社，1992 年）頁 30。其他有關討論請參閱彭懷恩編譯，意識型態與政治思想 Q & A（台北：風雲論壇有限公司，2005 年）頁 5-8；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出版社，1995 年）頁 445-6；李英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頁 48-9；李海青，「政治合法性的意識型態維度」，求實，2005 年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66；Tow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eds.,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p.219-21.

註²⁰ 陳宜中，「再論馬克思的意識型態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7 期，2000 年 3 月，頁 165。

註²¹ 「三支兩軍」是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任務的簡稱，是人民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標誌。」

使得軍隊政治與社會權力均急遽膨脹。因此，軍隊無論地位或所能獲得資源，與其他單位相較之下蔚為可觀。然而，由意識型態進而對毛澤東個人的神格化崇拜，導致意識型態由馬列主義為中心，轉向說法互相矛盾，內容又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毛澤東思想及語錄，這使得過去的功臣成為今日被打擊對象與罪人，讓許多軍隊領導人昏頭轉向，嚴重打擊軍隊士氣，到了甚至幾乎要發動兵變的地步。更有甚者，軍隊權力坐大的事實，引起毛澤東的猜忌與接下來的軍區司令員大調動。到了鄧小平時代，意識型態因為詮釋不同而再度轉向時，軍隊再一次遭到檢討，重新擬定「革命化」、「正規化」與「專業化」的發展方向，同時國防也由於被列為四個現代化的最末端而遭受連續十餘年的軍費縮減與員額裁編命運。

然而，基於歷史傳統與現實需求，中共軍隊始終扮演著意識型態守護者的角色，並在必要時給予任何意圖挑戰中共政權的組織或個人予以不留情面的打擊，就算是一再宣傳要保護的「人民」也不能例外，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在相當程度上說明了「人民軍隊」的真正性質與任務。中共軍隊無論如何與政治領黨人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分歧，在透過意

識型態來鞏固其合法性地位方面，雙方可說是唇齒相依的。

意識型態在維持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日漸降低²²，顯現在中共對於自身定位從過去的革命黨，向發展型執政黨性質轉型。對此，解決與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防貪拒腐和抵禦風險能力，就成為攸關中共能否延續其執政生命的關鍵議題；此外，為進一步適應中國經濟變化的現實，因而對共產主義教義繼續予以淡化處理，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取代「共產主義理想」²³；此外，根據中共十六大修改的新黨章，共產主義已經不再被界定為「社會制度」，而只是被視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岡指出，新黨章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以及在全球範圍是否適用問題上，做出了極富意義的修正；其一為不再將消滅剝削而消除兩極分化視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其二則是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視為適合中國國情的選擇道路，而非所有人類社會的必經途徑²⁴。儘管如此，意識型態在中國政治的發展中，有依據環境改變而變化之處，也有始終固定不變的地方²⁵。至於意識型態在那些方面鞏固中共政權與軍隊組織的合法性，

註²² 王曉麗，「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發展及合法性探析」，青海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頁8。

註²³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0與54。

註²⁴ 林岡，「中共的理論創新和意識型態轉型」，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107-8。

註²⁵ 亦即堅持與發展兩個面向，參見張娟、習裕軍，「社會轉型期的意識型態與執政合法性」，理論月刊，2006年第6期，2006年6月，頁61-3。

根據歷史與目前情勢歸納，有下列幾點：

一、反對帝國主義

列寧主義中心思想在反帝國主義，這與中國在 1840 年以後遭到百餘年帝國主義欺凌的傷痛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馬列意識型態既是反帝國主義的理論根據，其矛盾律與否定的否定等思維，也是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運用策略。更重要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潮，給予共產黨生存發展的空間，也成為最主要合法性來源。毛澤東先後或同時稱美蘇為「帝國主義」，其目的即在於喚起中國對於帝國主義長久以來的痛恨敵對態度；六四事件之後的 G7 會議，也被鄧小平定位為帝國主義再次孤立、欺負中國；面對 1999 年美國所領導北約聯軍進行科索沃戰爭，以及其後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被江澤民等領導人及官方媒體稱之為「新帝國主義」²⁶。由此可見，反對帝國主義既是意識型態對軍隊的要求，也是其合法性的來源。

中共領導人認為大陸共產主義性質的政權，是中國得以抗拒帝國主義危害的不二選擇。因此，如果放棄社會主義，那麼中國將再度落入帝國主義的恥辱命運。對於這一點，鄧小平與江澤民都曾提出相類似的觀點。此外，抵制資本主義文化與思想滲透，堅定地「維護社會主義及其意識型態」，也是維護

政治穩定的重要需求²⁷。

二、支持社會主義陣營

中國建立政權一年剛滿，便參加韓戰，直到 1958 年才將部隊全數撤回。在 1978 年以前，除了發動台海戰役外，也派兵援助北越對抗美國與南越；同時，中國為擴大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也或明或暗地支持各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尼泊爾等國家的共產游擊武裝力量，為此還遭到印尼斷絕外交關係。

冷戰結束後，由於東歐與蘇聯共產政權的瓦解，使得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降到個位數字，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究竟是否適合人類生活模式？這個問題直接衝擊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儘管北京採取「絕不當頭」的策略，避免遭到類似蘇聯的命運，但仍然積極支持「社會主義兄弟」，包括對北韓的經濟與軍事援助，與古巴等共產國家，以及中南美洲左派勢力持續發展友好關係²⁸。至於過去數度發生軍事衝突與邊界齟齬的越南，也開始排除衝突發生可能性，例如拓展邊境貿易，訂定邊界協議，在爭議地區或海區進行石油或資源探勘合作計畫等；同時雙方領導人也藉著越來越頻繁的互訪活動，以實際行動降低敵意，增信釋疑。中共甚至仍然堅持，共產主義國際化是共產黨的目標與其存在意義²⁹。

註²⁶ 參見房寧，新帝國主義時代與中國戰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年）。

註²⁷ 王郡里，「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指導原則」，余起芬主編，國際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35-6。

註²⁸ Jae Ho Chung,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p.157.

為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能夠持續下去，北京一方面反對其他國家對北韓採取激烈制裁手段，另一方面反過來要求平壤對包括核武在內議題保持克制態度，並且鼓勵金正日能夠效法中國大陸實施經濟改革，以免崩潰。一般相信，一旦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國仍將非常可能捲入其中並且與北韓並肩作戰²⁹；其原因除了地緣政治的考量之外，支持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也是中國決策的重要原因。

三、代表社會廣大利益

馬克思的矛盾律分正、反，誰能爭取到的力量越大，就越能掌握最終結果。就政權合法性來說也是如此³⁰，中共在第五次圍剿之前，堅持代表工人利益並發動城市暴動的結果，幾乎遭到覆滅的後果。此後中共採納毛澤東的意見，結合佔大陸人口八成的農民力量，才逐漸透過力量的轉換轉敗為勝。要能調動農村人口作為其作戰力量，並與為數甚少的工人聯合起來，爭取中間階級的支持，

就必須強調代表農民與工人無產階級階級的利益。因此，以工農階級軍隊自居就成為共軍的傳統。此外，1935 年以後，毛澤東除階級劃分外，也以民族主義作為劃分敵我的基礎，更擴大了原來工農階級的力量³¹。鄭永年指出，傳統上共產黨代表五個主要團體的利益，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解放軍和黨政官員。同時，黨員大多數具有無產階級的背景，或至少認為具有類似的背景³²。然而，改革開放後，為了確保中共藉由代表社會大部分利益，牢牢掌握政權；2001 年 7 月 1 日時任三合一領袖的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作為其思想標誌，站在結合社會大多數力量，壓制少數有可能引發內部安全憂慮的角度以觀，「三個代表」無疑仍在新世紀中承襲著馬列對於正、反力量的辯證運用。誠如吳樹青之言，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³³。大陸學者張健也指出，「三個代表」能夠使執政黨更加

註²⁹ Anatoly golitsyn, *The Perestroika Deception: The World Slide Toward the Second October Revolution* (London: Edward Halle, 1995)p.xxiv.

註³⁰ 張文木，「變動中的世界政治與日本問題」，中國軟科學，2006 年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21-3。

註³¹ 湯海生，「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探析」，達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4-5。

註³² 李英明與張亞中認為一九三五年起毛澤東由階級革命逐漸轉變為民族主義革命，但實際上兩者是相互為用的，因此可以看做是擴大而非取代關係，參見李英明、張亞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生智出版社，2000 年）頁 7。

註³³ 鄭永年，「中國共產黨的轉型」，裴敏欣主編，中南海的選擇（台北：八方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45。

註³⁴ 吳樹青，「『第一要務』論斷：對馬克思的堅持和發展」，其他有關三個代表論述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繼承關係分析，均可參見中共北京市前線雜誌社、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學習與研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持久地維持執政地位，同時亦能使掌權者在實施控制中耗費較低的成本³⁵。

中國共產黨擴大對社會階級的吸收，有助於穩固執政根基³⁶；但是一些隱憂也同時出現並成為其所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首先，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誰的利益應當被代表？其次如何代表各階級利益？再者，如何協調各階級利益？第四，共產黨的基本定位是什麼³⁷？可見，共產黨對上述問題的回應，將使得其原來的黨性因強調適應社會變化而變質，或至少變得更加模糊不清，在這樣情況下，未來中共如何在回溯其合法性來源時，其論述仍能適用於今甚至未來，並達到建構「和諧社會」作為合法性來源的新基礎³⁸，將是非常嚴肅的課題。

同樣重要的是，中共強調代表社會廣大利益，主要目的在於盡可能將大部分社會主流力量納入政權所統合的體制之中，但並非援引社會力量的參與。毛澤東與鄧小平皆曾經在權力鬥爭關鍵時期，援引社會力量作為打擊政敵的資源。一旦達到目的便立刻收緊社會力量參與的機會，以免該力量會如同文

化大革命時期一般反噬，導致政權因此而崩潰。因此，吳玉山認為有無援引社會力量作為派系鬥爭的資源，最終成為導致東歐、蘇聯與中共、越南兩組共產政權覆滅與存活的關鍵性差別之一³⁹。因此，北京主要目的在於為了尋求支持而有限地擴大參與管道，但絕不是藉著參與極大化以打擊政敵，並最終造成尾大不掉傷害政權合法性的方式。

四、堅持毛澤東軍事思想

毛澤東思想在中共召開「七大」時，被提升到神格化的境界⁴⁰，使得 1935 年遵義會議後所確立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不僅是以劣勝強的法寶，提供共軍作為抵抗日軍進攻與擊敗國民黨優勢軍力的策略，更是中共軍隊所應服從奉行的意識型態。

幾件事情可以說明毛澤東軍事思想被當作共軍奉行的意識型態的現象，其一是 1958 年中共以戰略思想著稱的劉伯承元帥，由於過度強調西方資本主義階級軍事思想，遭到公開自我檢討並接受批判而淚灑當場的窘境；1959 年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與總參謀長黃克誠因廬山會議下台時，其中一項罪名亦為在

註³⁵ 張健，「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執政黨的合法性」，江西行政學院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28。

註³⁶ 劉長發，「試論黨的執政地位的合法性」，攀登雙月刊，第 24 卷第 2 期，總 138 期，2005 年 4 月，頁 12。

註³⁷ Bruce J. Dickson，頁 62-4。

註³⁸ 沈春光，「試論政治的合法性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構」，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2005 年 4 月，頁 90-2。

註³⁹ 參見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註⁴⁰ 陳璋津，中共的權力機制（台北：唐山書局出版社，1995 年）頁 96-107。



軍中推動「唯軍事主義」；1966 年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大陸各地軍隊，不論陸海空，均強調「政治掛帥」而不顧現實教育訓練與專業化的實際需求；直到毛澤東死後才逐漸從扭扭捏捏地暗示，轉而追求「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並以此作為現代化與專業化的合法性外衣。就算是現在強調信息化戰爭戰略時期的中共軍隊，在許多重要演習與兵力整建活動中，軍事領導人仍會高呼「人民戰爭」指導一切，論證毛澤東思想仍具「時代意義」。更重要的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堅持」與「發展」，是軍事領導人獲得領導合法性地位的重要來源。

從毛澤東重視軍隊政治性，到鄧小平的三化政策，也就是「政治化、專業化與現代化」，以及接下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中國不僅將這些思想與馬列思想聯繫成該思想中國化的必然結果，就此意義而言，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為中國革命戰爭時期的馬列軍事思想第一次飛躍，鄧小平為和平建設時期

的第二次飛躍，江澤民則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的第三次飛躍，同時賦予中共軍事領導人穩固的正統性體系地位^①，避免遭到軍隊質疑而處於不利被動的地位。

至於尚未建構出一套完整軍事論述前的中共第四代，根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2007 年 3 月的十屆人大第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堅持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與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外，同時必須貫徹「胡錦濤同志關於軍隊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②，其「承先啟後」的正統接棒意義不言自明。

經濟發展

毛澤東掌權時期，中國大陸由於極左路線，使得文化大革命發生後，中國共產黨與北京政權的權威性遭到災難性的破壞，處於崩潰邊緣的經濟也讓中國離富國強兵越來越遠^③，連帶在政權合法性方面也遭到質疑^④。

可以說，光靠意識型態作為政權正當性的支

註① 馬宏偉、張怡恬，「中國現代軍事思想與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中國化」，人民日報，2005 年 6 月 24 日，版 6。

註② 姚大偉，「溫家寶說：國防軍隊建設是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新華網，2007 年 3 月 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3/05/content_5803183.htm

註③ 在毛時期的中國，若說不重視經濟建設那絕對不是正確的說法；毛不僅重視經濟建設，還多次下達各項經濟建設的指示。但是，由於他以意識型態及群眾動員方式作為經濟建設的手段，再加上不同經濟發展派系主張之間的權力鬥爭，而抹殺經濟發展應有的客觀環境與規律，最終導致像一九五九年那樣作物豐收卻餓殍盈野，估計四千萬人因此餓死的大災難。借用李澤厚之言，就是毛澤東迷信戰爭經驗，也正是這種強調兩軍對戰、一分为二的「軍事馬克思主義」的成功經驗，在執政之後仍然用來搞經濟建設，違反經濟發展自身規律，並且認為這樣就是馬克思主義，結果弄得大陸仍然是一窮二白。李澤厚，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 年）頁 319-20。

註④ 儘管有學者指出，說毛毫無經濟方面的成就，不是公允的看法，但在毛死之際，大陸已陷於經濟崩潰
接續下一頁

柱，已經愈來愈力有未逮。可以看到，冷戰後期開始，意識型態的作用越來越淡，如果不能另外尋找合法性來源，中共 1980 年代末期非常有可能遭逢與其他東歐國家和蘇聯的「革命」威脅，這也是鄧小平所謂的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相結合對中共所形成在政權穩定上的壓力。其中，最重要的替代性手段便是經濟發展上的成就。中共黨史專家汪博武在討論鄧小平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時指出，以經濟增長作為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及反饋人民群眾日常增長的物質利益需要的途徑，就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⁴⁵。

解決經濟的問題，進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成為鄧小平執政期間的主要任務。再加上，鄧小平對國際情勢的樂觀⁴⁶。1978 年開始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肇因於此。而發展經濟就成了中國自 1978 年迄今的國家戰略目標。為了實現「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目標，全力發展經濟，在外交戰略上強調「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思維，希望營造

和平的外交環境，積極的在內部發展經濟，中國國務院在 1995 年一份報告中提出「中國需要在和平環境中專心致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⁴⁷。

在經濟戰略上，藉由在沿海地區設立經濟特區，提供廣大廉價勞動力及市場，以吸引國外資金進入中國，及國有企業的改革等作為，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式改革」⁴⁸。這一連串的政策作為背後，就是要解決中國所面臨國家危機的根本問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戰略，確實使得中國的經濟得到了非常顯著的改善⁴⁹。按照鄧小平的構想及為中國所作的擘畫，希望在 2050 年中國就應該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

隨後，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鄧小平將其政治權力交給江澤民，江澤民成為第三代領導班子的核心，遵循「改革開放」的目標，並且深化改革，追隨鄧小平的國家戰略「總路線」，也就成為江澤民執政之初最重要政策。江澤民並且指出，在 2010 年前的 15 年裡，世界經濟將會呈現快速成長的趨

邊緣則是不爭的事實。參見 Chris Bramall, 李小川等譯，毛時代經濟再評價：四川：1930-1980s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 頁 1-28；陳一諮，「引言：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革及其成敗」，陳一諮、李少民、于大海等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1 年）頁 1-4。

註⁴⁵ 汪博武，「試論鄧小平執政合法性思想」，求實，2006 年第 4 期，2006 年 4 月，頁 14。

註⁴⁶ 鄧小平認為當今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價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降低，但區域衝突仍會發生。平松茂雄，前揭書，頁 9。

註⁴⁷ 張建邦總策劃，林中斌審校，前揭書，頁 75。

註⁴⁸ 黎萍主編，中國下一步怎麼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 年 2 月），頁 130。

註⁴⁹ 中國的高經濟成長率，及國民所得倍增，是其他國家難以達成的。請參閱 John King Fairbank, Merle Goldman, 薛純譯，費正清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2002 年 3 月），頁 464。

勢，此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關鍵時期⁵⁰。現在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的胡錦濤，到目前為止，亦延續著鄧小平所訂下的經濟改革戰略「總路線」不變，並且持續擴大及加速深化「改革開放」。

為此，中共提出「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之商品經濟，計畫體制的改革著重於「適當縮小指令性計畫範圍，擴大指導性計畫的範圍，注意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其目標，採對內進行改革及對外開放。改革重在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先從農村制度改革起，在進行全面改革，並要求行政效率的改革。對外開放從三方面進行，一為對西方國家之開放，以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為主；二為對蘇聯和東歐國家之開放，進行商貿和技術合作；三為對第三世界開放，以互通有無為主⁵¹。其戰略目標在於達到，鄧小平所設計的「三步走」戰略，這樣的戰略在中共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獲得確認；所謂三步走即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本世紀中

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⁵²。現在，正當大陸面臨全球化、市場化趨勢下，對於政府改革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分配流向上下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情況下⁵³，為了加速經濟發展，推動中國的對外開放，緩解糧食、產業與原料以及金融三方面安全隱憂⁵⁴，並力求全面實施「跨世紀經濟發展戰略」，其內容包括「新三步走」、「掌握戰略機遇期」、「進一步拓展海洋經濟」⁵⁵：

一、新三步走政策

中共在2000年時達到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目標，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的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面向21世紀，初步提出了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指導方針和主要任務，特別是規定了到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鬥目標。江澤民在「十五」大上表示：「21世紀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年時，使國民經

註⁵⁰ 張建邦總策劃，林中斌審校，前揭書，頁74.75。

註⁵¹ 石義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台灣經濟，第191期，1992年11月，頁76-100。

註⁵² 李忠傑，「新的『三步走』戰略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光明日報，2002年9月24日，版2。

註⁵³ 佔美柏，「有限政府之合法性論說」，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16期，2005年第3期，2005年3月，頁49；張尚仁，「政府改革論綱」，學術研究，2003年第9期，頁44。

註⁵⁴ 龍華，溫家寶執政內幕（台北：創智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頁14-5。

註⁵⁵ 黃金聲、唐複全、徐明善，「中華民族邁向新世紀的海洋戰略思維－我國三代領導人關於新時期海洋戰略的重要決策和論述」，國家海洋局網站資料。

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 100 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⁵⁶。」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新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按照這個戰略規則，中共將分 2010、2020 及 2050 三個階段，逐步達到現代化的目標⁵⁷。

2010 年前，是第一步。中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鬥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 14 億以內，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在這 10 年的發展速度保持在 7 % 以上，實現比 2000 年翻一番的可能性將大增。從 2010 年到 2020 年是第二步。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中共規劃十年翻一番。但由於基數逐步增大，翻番的難度也逐步增大。所以，第二步能否再翻一番，需要作科學的分析和預算。為了爭取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緊緊跟上世界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潮流，使中共的經濟體制和其他制度更加健全，使基本政策保持較高的穩定性，使抵禦各種風險的能力有

新的提高。從 2020 年到 2050 年是第三步。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當時的中等發達國家水準。

二、戰略機遇期的制訂

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21 世紀頭 20 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期。同時，中共也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屆時，中國應該可以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富強之國。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重大的國際戰略機遇期。中國在這三次機遇面前的表現是不同的，因而給自己造成的後果也各不相同⁵⁸：第一次是有條件抓住卻沒有覺察而錯過，結果開始了全面落後於西方的歷史⁵⁹；第二次是強烈意識到了機遇，並進行相當的努力，但終因沒有把握關鍵重點而再次錯失，其結果是中國在「千古變局」之下，不但進一步落後於西方，而且還被近鄰日本甩到後頭⁶⁰；第三次機遇期到來時，中國最初的意識並不清晰，最終可謂把握了一半，仍然沒有實現中國復興的夢想⁶¹。對

註⁵⁶ 摘自李忠傑，「新的『三步走』戰略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光明日報，2002 年 9 月 24 日，版 2。

註⁵⁷ 韓民青，「新工業革命與中國 21 世紀發展戰略」，山東社會科學，2003 年第 4 期，2003 年 4 月，頁 1-23。

註⁵⁸ 李成勳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應該確立『戰略效益』這個新概念」，理論前沿，1998 年第 4 期，1998 年 4 月，頁 21。

註⁵⁹ 第一次機遇期：大航海與鄭和下西洋，中國面臨第一次戰略機遇期可以追溯到西元 15 世紀末期，其競爭對手是西歐。

註⁶⁰ 第二次機遇期：中日的洋務運動競賽。

註⁶¹ 第三次機遇：中國只把握住一半，二戰後美蘇兩霸的冷戰對峙，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再次為許多國家提供了重大的戰略機遇。之所以說中國只是利用了一半機會，是因為中國對這次機會的利用在前期是不自覺的，選擇的方向也存在一些問題。在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的 20 世紀 6、70 年代，中國卻把大量的精力浪費在內亂上，搞自我封閉，也喪失了一半的時機。

於第四次國際戰略機遇期的到來，北京認為雖然中國在前三次戰略機遇面前的表現令人惋惜，但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它們提供了諸多的經驗與教訓。而且通過對前三次國際戰略機遇期的觀察，可以大致總結出能成為國際戰略機遇期的要素，從而為中國判斷下一次機遇做準備。

對中國而言，一段時間要成為國際戰略機遇期，一般包括三個條件^②：一是較好的和平環境，主要國家之間沒有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二是出現能夠促發生產力跳躍發展的重大發現與發明，這一點在第一次機遇期中體現為地理大發現與隨即開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在後兩次機遇期中體現為第二次科技革命與第三次科技革命；三是世界經濟持續發展。從這三方面來看，可以說冷戰結束到現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第四次戰略機遇。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面前，只有兩種命運：一是抓住機會，奮起直追，一是越來越邊緣化。而對中國來說，這一次的國際戰略機遇甚至比前三次都要好。

就國際戰略機遇的第二個條件而言，全球正在進行以資訊革命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這為後發國家追趕先進創造了機會。印度軟體業的迅猛發展體現了這種可能。中國的漢字與資訊技術存在融合的優勢，漢字的輸入速度甚至比英文字母還快；而使用漢語和漢字的人群總數甚至超過使用英語的人群，為資訊技術的漢化和在漢語漢字人群中的運用提供了強大的市場經濟動力。中國能

夠在短短十年中就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手機市場，表明了中國發展資訊技術的巨大的潛力。當然，中國具體應該如何在資訊革命中創造財富、提升國力，是一個還應該認真研究的課題，但北京認為這次科技革命為中國提供的機會毋庸置疑，而且不能再次錯過。中國的全面小康社會能夠、而且必須在資訊革命強大動力的推動下快速成長。

中國這些年取得的成就與全球化趨勢緊密相關。根據外經貿部的統計：中國累計在開放以來已經吸收了外資 3 千億美元，2003 年中國吸引的外資達到 5 百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2002 年 3 月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 2,276 億美元，是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外匯儲備國；同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對外貿易國。所以，面對全球化這一雙刃劍，許多國家應對不力而陷入苦難，中國則可以說化解了不少衝擊，成為全球化中的受益者之一。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經而且將繼續為中國的成長提供外部的經濟條件。所以，中國將此段期間視為強權所不可輕易錯過的戰略機遇期。

三、拓展海洋經濟利益

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現有陸地資源的開發利用難度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中國是海洋大國，具有發展海洋經濟的優勢。根據張澤南與張璐的估計，大陸擁有廣闊的自然造陸地區，每年增加淤土 23 平方公里，增加新的土地資源。有 160 餘處優良港址，其中可建萬噸級港址有 40

註② 葉自成、吳東，「中國國際戰略機遇不容錯過」，南方週末，2002 年 11 月 30 日，版 6。

餘處、十萬噸級的則有 10 多處。此外，還有 20,278 種海洋生物、250 噸油氣資源、豐富的海水化學資源、各類礦床高達 835 個再加上 1,500 餘處海洋旅遊景點。

目前，大陸海洋運輸業已居世界第八位，成為世界海運 A 類理事國；全球第三位造船大國⁶³，水產總量與總值均連續 10 年執全世界之牛耳，並且已經形成包括海洋水產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濱旅遊業、海洋油氣、沿海造船業、海洋鹽業、海濱砂礦業等七個主要海洋產業⁶⁴。因此，「中華民族復興大業」與「和平發展」，必然越來越多地依賴海洋：中國資源安全依賴海洋，海洋是食物資源、油氣資源、水資源和戰略金屬資源的戰略性開發基地；中國對國際資源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能源、原材料進口大幅增加；中國 80 % 的外貿貨物依賴海上運輸，必須利用全球海洋戰略通道，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國防安全主要威脅來自海上，加強海防建設是保障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前提。

更重要的是，世界海洋產業的增長率高

達 20 %⁶⁵，可說是全球經濟界經濟新亮點。在競爭日益激烈尖銳的 21 世紀，被視為是「海洋世紀」，世界進入全面開發利用海洋的新時期。各國戰略家都把目光聚向海洋，把海洋當作人類生存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領域，海洋的開發利用已成為決定國家興衰的基本因素之一⁶⁶。大部分國家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為契機，將在海洋上展開競爭，新的一輪海洋鬥爭已呈現群雄逐鹿之勢⁶⁷。對大陸而言，1979 年 4 月是中國進入海洋經濟的一個關鍵時期，當時鄧小平首先提出在廣東深圳、珠海、廈門四個沿海城市試驗經濟特區。此沿海經濟特區的實施，使大陸經濟發展進入一個以沿海地區為中心，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漸漸形成；沿海 12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發揮各自優勢，使得今天中共極具發展潛力的沿海地區以占全國 13 % 土地面積，創造了占 60 % 的國民生產總值⁶⁸。在 1980 年代以後，開始積極發展海洋經濟，海洋產業在 1980 年代的發展速度就達到 17%；1990 年代以後隨著科技

註⁶³ 2006 年中國造船完工量達 1,452 萬載重噸，比前一年增長 20 % 佔全球市場 19 %，不僅連續 12 年位居世界第三，還進一步與日韓縮小差距中，參閱「我國船舶工業與日韓逐步縮小」，艦船知識，第 331 期，2007 年 4 月，頁 4。

註⁶⁴ 張澤南、張璐，海疆縱覽：中國海域地理變遷和資源開發（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 年）頁 24-6。

註⁶⁵ 「海洋化工產業的發展將會面臨機遇與嚴峻的挑戰」，中國科技信息網，2007 年 5 月 10 日，網址：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702/1_20070205_151200.html

註⁶⁶ 王芳、劉家沂，「關於制訂中國海洋國策的建議」，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網站，2006 年 2 月，網址：<http://www.cima.gov.cn/gongzudongtai/2006/02.pdf>

註⁶⁷ 「世界海洋產業發展態勢」，中國海洋經濟網，2007 年 3 月 13 日，網址：<http://www.mercc.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4>

註⁶⁸ 吳純光，太平洋上的較量－中國問題報告（北京：今日中國出版，1998 年）頁 38。

的進步以及中國大陸資源日益減少，甚至成為石油輸入國家，如何確保海洋經濟資源利益，以及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保障，成為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無可迴避的挑戰^{⑥9}。

然而，當前中國海洋利益面臨包括三個方面的主要侵害：一是島嶼被侵佔。在中國東海方向，日本一些右翼團體和極少數地方議員頻頻登上釣魚島，企圖造成既成事實，並試圖以該島為起點，與中國爭奪東海部分海域；在中國的南海方向，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一些周邊國家已陸續侵佔了 44 個島礁。二是海域被分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領海範圍擴大到 12 海浬，並規定 200 海浬的專屬經濟區。中國與各領國之間沒有達到 400 海浬的自然地理現象，這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與領國不可能同時擁有寬達 200 海浬的專屬經濟區，解決辦法只能是通過相互協商，但一些國家單方面宣布海洋專屬經濟區的大陸架，造成中國 120 至 150 萬平方公里海域為爭議區。三是資源遭掠奪。中國海洋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魚類等資源，受經濟利益趨勢，周邊許多國家侵犯了中國的海洋資源，而且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置之不理，寧願與世界一些石油公司合作開採，也不願意同中國進行共同開發^{⑦0}。此外，隨著漁業經濟

的發展與擴大，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漁業糾紛亦日益尖銳；1989 至 1999 年的 10 年之間，僅菲律賓海軍逮捕居留或撞沈大陸漁船事件便高達 36 起。2000 年 1 月與 5 月，又分別發生菲律賓海軍驅趕在南海海域作業的中國漁船，以及槍殺船長事件^{⑦1}。顯見當今的海洋鬥爭已非往日，不能單憑艦隊的佔領與征服來解決問題。海洋鬥爭的核心是巨大潛在的經濟利益，主要靠經濟投入和科技力量來取勝，需要進行政治、軍事、外交、科技、法律諸領域的綜合較量來取得優勢，比以往的海洋鬥爭要複雜、廣泛和深刻得多。

此外，當前全球資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紀的地域性封閉性質並轉化為世界性的開放方式，而海洋又是暢流世界各個角落的最便捷的載體，那麼從軍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戰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權，就成為大國控制世界資源並據此保持其大國地位乃至霸權地位的主要方式。對北京來說，海洋的問題，最終還是國家整體實力的問題。現在最缺的是力量支撐。海上交通力量問題本質上是個海軍問題。現在可以說，大陸經濟上的神經已經伸向全世界，而「骨頭（指海軍力量）」卻沒跟上。在南海問題方面，目前中國、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以及臺灣（即中國所稱「五國六方」）都聲稱擁有南沙群島中

註^{⑥9} Andrew F. Krepinevich, Jr., "The Conflict Environment of 2016: A Scenario- Based Approach,"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Oct. 1996, website: [www. Csbaonline.org](http://www.Csbaonline.org)

註^{⑦0} 陶春，「中國海洋利益面臨侵害 需制定海洋戰略維護海權」，中國新聞網，2005 年 07 月 20 日，網址：<http://jczs.news.sina.com.cn/2005-07-20/0904307435.html>

註^{⑦1} 金鑫，中國問題報告：新世紀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1 年）頁 141-7。

全部或部分島嶼的主權。除汶萊外，其他五方均在南沙群島駐有軍隊。整個南海的石油地質儲量初步估計大致在 230 億至 300 億噸之間，有「第二個波斯灣」之稱⁷²。從南海周邊地區已探明的石油儲量來看，南海的石油儲量具有相當規模，特別是在南部，即南沙群島附近有爭議的海域。目前，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某些地區進行勘探、開採，已經形成了相當大的生產能力⁷³。特別是目前，經過麻六甲海峽運送的石油數量約占中共石油進口總量的 70 % 以上，每天通過麻六甲海峽的船隻近 26.7 % 是中國船隻⁷⁴。中共海軍的作戰能力還僅僅限於近海。中國對遠海海域的國家安全關注得不夠，這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是不匹配的。

由於中國在海洋上存在廣泛戰略利益，北京意識到，21 世紀將是中國發展綜合國力的世紀。提昇綜合國力，必須大膽地走向海洋，要走向海洋，必須有一支與之相適應的海上力量。鄧小平提出：「面對霸權主義的強大海軍，沒有適當的力量也不行。這個要真正現代化的東西。⁷⁵」於是，確立「近海防禦」的海軍發展戰略。江澤民亦曾多次指

出：「我們一定要從戰略高度認識海洋，增強全民族的海洋意識」，在其「振興海業，繁榮經濟」的指示下，積極提振各地區、各行業的海洋意識，「科技興海」、「可持續發展」戰略，國家海上綜合力量的發展、建設海上長城。同時，江還多次視察海軍部隊的演習，號召「加快海軍現代建設步伐，維繫中國海防安全，促進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並告訴中共海軍是高技術兵種，要很好地學習和掌握現代化技術，成為思想、技術都超強的海上精兵。建設一支與中共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海上武力，現已經逐步成為各軍兵種的共識。

總體而言，由於中國政府採取許多經濟改革措施，不僅成功締造許多驚人經濟成就，讓改革後二十餘年來經濟成長率平均達 9 % 的成績，根據日本智庫 PHP 綜合研究所歷時兩年所完成的報告顯示，大陸國內 GDP 將在 5 年內超越日本，到 2010 年大陸領先日本經濟的幅度將會更大⁷⁶。也為社會穩定與政權合法性提供有利的基礎。在探究中國與其他東歐及蘇聯共產國家在 1989 年以後命運大不同的原因時，吳玉山認為中共堅持一黨專政，

註⁷² 「未來的第二個波斯灣—南沙群島」，石油透視網，2006 年 6 月 9 日，網址：<http://blog.roodo.com/oilinsight/archives/1730495.html>

註⁷³ 「[亞太觀察]中越菲協商開發南海爭議海域」，楚天都市報（湖北），2005 年 7 月 11 日，版 7。<http://www.cnhubei.com/200503/ca809236.htm>

註⁷⁴ 「台灣中國出海口」，蘋果日報，2004 年 1 月 2 日，版 3。

註⁷⁵ 「葉飛：鄧小平同志指明了新時期海軍建設的方向」，東北網，2007 年 2 月 17 日，網址：<http://special.big5.northeast.cn/system/2007/02/16/050709480.shtml>

註⁷⁶ 「2020 年成熟的中國對日有利」，聯合報，2008 年 6 月 28 日，版 12。

先行經濟而非政治改革，使得經濟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成長，同時經濟繁榮之後，又反過來強化北京政權的合法性，是其能夠在「蘇東波」浪潮之下仍能繼續政權的根本原因⁷⁷。根據童振源的估計，未來短期內中國經濟仍會維持快速增長勢頭(6-8 %)；但是中國也可能由快速經濟增長轉變為全盤經濟崩潰，其中最主要關鍵在於中國是否能成功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與成功化解目前社會存在的矛盾⁷⁸。與此同時，能否發展資訊科技能力與爭取海洋經濟利益，並將海洋作為穩定大陸週邊環境，持續經濟穩定發展基礎，中國經濟政策與軍事權力的配合成效⁷⁹，更是決定經

濟維持成長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民族主義

近年來民族主義的情感與運動在全世界似乎有著復甦的跡象⁸⁰，一般來說，民族主義係指同民族之組成份子，對其民族基於主觀意識的自我體認。這種自我體認的結果，產生本民族與他民族的區分，形成以本民族利益為重的民族意識，或產生民族國家觀念，達成民族國家理想⁸¹。可以這樣說，所謂民族主義就是一種起源於相同宗族、血緣、文化、風俗或習慣的團體認同感，或一種意識型態⁸²。繼而產生出內外有別的情緒（感情

註⁷⁷ 參見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社，1996年）。

註⁷⁸ 童振源，「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轉型與挑戰」，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65-6。

註⁷⁹ 鈕先鍾，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前瞻（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頁73。

註⁸⁰ 有關這方面論述，可參見羅志平，「民族主義分類之二元論思考」，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7期，2005年7月，頁223-50。

註⁸¹ 許義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特質」，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第十二輯，1990年12月，頁1-18。對於民族主義的定義，一項是學界爭議的熱點。對此，可以參考列作者的意見，Louise Snyd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 (New Brunswick, N.J. 1954) pp.196-7;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1944)p.10.; G. Schopflin and G. Hosking, eds., *Myths and Nationhood* (London: Hurst Press, 1997)p.7; K.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pp.48-9; Peter Hays Gries, *China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p.1; 王曉明，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型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81-2；Rod Hague, Martin Harrop and Shaun Breslin, 侍建宇譯，比較政府與政治（*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18-9；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年）頁60-1；John K. Fairbank, 薛峴譯，費正清論中國(*China: A New History*)（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社，1992年）頁363；丁學良，「共產主義後社會中的『主義』」，周雪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頁44；呂亞力，政治學概要（台北：三民書局出版社，1992年）頁8-9；彭懷恩編譯，意識型態與政治思想Q & A（台北：風雲論壇有限公司，2005年）頁143；張茂桂，「是批判意識型態，抑或獵殺巫婆？對於趙剛〈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一文的回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1996年7月，頁264-5。

或仇恨）與凝聚力。這樣的凝聚力，將產生成為一個獨立政治組織，特別是國家的願望。以這樣的觀點審視，可以說明一個民族卻成立多個國家，或多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現象；同時也能解釋對外的情緒（友好或仇恨），以及為求獨立自主，不論是歷史或現實利益糾葛所導致，成為民族間仇恨與紛爭的根源。力量強弱大小不同種族之間的征伐與臣服現實，導致民族在尋求成為獨立政治組織過程中，產生許多紛爭甚至難以化解的歷史仇恨遺緒。

由於民族主義為歐美國家體制產物，因此中國直到 1840 年代以後，在外患與內憂（包括對朝廷腐敗憤恨）交互作用下，才逐

漸透過引進與學習而來⁸³。成立中國共產黨之後，民族主義情緒成為其對抗國民黨軍隊打擊，尋求人民由認同進而支持的合法性地位支柱之一。John K. Fairbank 甚至認為毛澤東將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結果，使得不再代表共產國際的共產黨意識型態與本土意識中的民族主義情緒相結合，成為其力量真正來源⁸⁴。因此中共自建立政權起，就懷著極為濃重的民族主義情緒⁸⁵，這使得毛澤東於 1958 年敢於拒絕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有關建立「聯合艦隊」與長波台的建議⁸⁶，並在隨後的 1960、1970 年代與蘇聯在邊境發生軍事衝突⁸⁷與陳兵百萬對峙⁸⁸；這樣的情況，到了鄧小平時期，儘管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

註⁸² 有關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意識型態的論述，參見石之瑜，「民族、民族研究、民族主義：兼論做為意識型態的社會科學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3 期，2001 年 7、8 月，頁 97-110。

註⁸³ 轉引自龍華，胡溫新政內幕（台北：創智文化有限公司，2004 年）頁 52。至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意涵，同樣有不同的看法。請參見梁啟超，「新民說·論新民為中國今日第一急務」，吳松主編，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549；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326-9；孫中山，「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5；丁學良，「共產主義後社會中的『主義』」，周雪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頁 44；房寧，新帝國主義時代與中國戰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年）頁 370-1；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p.147; Lucian Pye,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Policy*, Vol. 69, No.4, 1990, pp.56-74. 錢雪梅，「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定位初探」，世界民族，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1-10。Parks Coble, 馬俊亞譯，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石海軍，「從民族主義到後殖民主義」，文藝研究，2004 年第 3 期，2004 年 3 月，頁 47。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1944)p.10。

註⁸⁴ John K. Fairbank, 薛峴譯，費正清論中國（China: A New History）（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社，1992 年）頁 363。

註⁸⁵ 根據學者指出，融合霸權思想、民族主義、與馬列主義的價值觀，在中共領導人當中普遍存在，毛澤東尤其是典型代表。Jonathan Dimbleby, 張弘遠、管中祥、林孟和譯，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頁 50。

註⁸⁶ 請參閱 Nikita S. Khrushchev,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pp. 258-261.

註⁸⁷ 李連慶，冷暖歲月一波三折的中蘇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頁 346-360。

註⁸⁸ 1980 年 11 月 15 日，鄧小平對美國記者的談話。人民日報，1980 年 11 月 24 日，轉引自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65。

民族主義情緒不但並未消散，反而成為意識型態作用淡化之後，成為除經濟發展以外的支撐共產政權的主要支柱⁸⁹。陳彥便指出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原有官方意識型態正在淡出，新的意識型態正在趁虛而入，可以斷言，以一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型態代替另一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型態，其間一定有捷徑可走，民族主義在此時受到官方青睞，顯然絕非偶然⁹⁰。同樣值得思考的是，David Lampton 指出中國喜好援引民族主義情緒的原因在於政治繼承並未制度化，使得民族主義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另外，領導者也必須透過民族主義情緒，讓廣大人民能夠忍受經濟改革過程中所感受的痛苦⁹¹。尤有甚者，透過民族主義情緒所公開表達的社會輿論，有利於中共領導人對抗外來的壓力⁹²。有助於中共在與國際交往時，保有一定的自主性與對某項議題的堅持，包括政治改革與人權議題在內均如是。

1990 年代以後，由於中國在綜合國力方面明顯崛起，以及中共的刻意操作之下，民族主義情緒呈現兩極化的矛盾方向發展；其一是由於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量增強所伴隨而來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則

是源自於前述遭到侵略所遺留的「受害」情結遺緒。中共於 2003 年提出「和平崛起」做為中共國家戰略主軸的同時，不僅認為未來二十年為中共崛起的「戰略機遇期」，也不斷提出「中華民族」的第四次崛起，以尋求大陸社會內部對中共政權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持續支持，保障其合法性與正當性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主義情緒自然也是其軍事戰略發展決策過程中的重要「內驅力」之一⁹³。不過，對於大陸民族主義的性質，筆者贊同陳永發所提出「框架民族主義」的觀點，這意味著在溫和與極端天平兩端，呈現出辯證性質的民族主義，在這樣情形下，北京政權鼓勵有利於其政權合法性的，帶有強烈情緒的民族主義；然而一旦這樣的情緒發展到威脅到中共政權與大陸社會的穩定，或限制其政策彈性致使嚴重損失利益時，中共便透過政府及民間機構予以壓制，至此讓民族主義朝溫和方向發展；不過，一旦民族主義情緒溫和到無法形成對政權的支持力量，或趨於冷漠時，中共又開始透過一連串政策措施，例如推舉「民族英雄」，設置「愛國教育基地」，甚至藉著「鳴放警鐘」以記住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侵略與暴行等手段，來

註⁸⁹ Michael A. Lev, "China's first manned spaceflight ends after 21-hour orbit of Earth," The Oklahoma Daily, October 16, 2003, p.1.

註⁹⁰ 同前註，頁 139-40。

註⁹¹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7.

註⁹² David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 in David Shambaugh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6.

註⁹³ 林宗達，*蛻變中的軍事強權：中共軍事革新的動力*（台北：時英出版社，2001 年）頁 270。

激發大陸民族主義情緒。因此，歸納而言，大陸民族主義政權合法性作用上，可以分別從提振民族自豪感，以及運用民族主義大旗防止各項「顛覆、破壞」活動。

一、科技民族主義

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一詞一般而言，存在許多不同用法，且在使用上往往顯得模糊不清，大體來說是指技術對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而言至關重要，一國發展政策必須有明確的戰略基礎，而國家為與其他國家競爭則必須不計代價將技術本土化，並推廣至體系各個角落⁹⁴。因此，以技術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概念，首先意謂領導人明確地將技術成就與國家相對國際地位加以連結。對中共領導人而言，這種想法還包括了 Richard Samuels 所謂的「技術與安全意識型態（technology and security ideology）」在內，且展現在下列方向上，也就是本土化取代進口、將所得技術推廣至經濟體各處，以及培養創新製造能力。因此，這樣將技術關係到國家安全的想法與作法，可以統稱為技術民族主義⁹⁵。不過，如果對照其他國家的國防建設過程，可以很容易就發現，前面學者們所謂的「科技民族主義」顯然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色彩。根據他們的意見顯示，既然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包括

美俄英法等能夠製造出物廉價美的武器系統，強求自己在技術水準或市場上不發達情況下自行研製，顯然並不是一個合算、「理性」的政策。然而，科技，特別是國防工業攸關國家生存與發展，因此各國莫不想盡辦法透過技術交流或自行研發達到「自主國防」的目標。中國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因此要以此論斷其具有「科技民族主義」的特殊性，顯然言過其實。不過，以此作為觀察民族主義情緒對防務政策方面的影響作用，倒是值得參考的一項指標。

中國軍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房寧在論及中國國防政策時指出，在國防現代化過程中堅持獨立自主，除了能夠掌握國防建設主動權，避免受制於人、提高國防費效比，爭取少花錢多辦事以及帶動本國經濟，發展科技外，還能增強民族自感和自信心⁹⁶。大陸許多包括航天工程在內的科技專家，在進行科技突破工程時，幾乎都表示「民族自豪感」是他們的首要考量。中共載人航太總設計師王永志在接受訪問時便說道：「中國載人航太工程的起點究竟定在哪裡？根據中國國情，還是以飛船起步更為合適。但是，當時就考慮一個問題，它能極大地增強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嗎？」、「怎樣才能搞出一個飛船來還能讓中國人民感到自豪，還能壯了國威、

註⁹⁴ Walter A. McDougall,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p.5. Evan 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5.

註⁹⁵ Richard J. Samuels, Rich Naylor,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3.

註⁹⁶ 方寧，「試論我國新時期的國防政策」，中國軍事科學，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頁43-9。

振了民心？當時，行政領導小組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技術線也在思考這個問題。⁹⁷」因此中國航天科學家始終堅稱，神舟系列飛船是完全國人自行設計與自行製造的，並不是抄襲俄羅斯的產品。不僅如此，民族主義的考量，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武器發展的最終決策。例如，在 1960 年中期以後，儘管中共軍方評估最具成本效益的武器是轟炸機，然而基於國家聲望與民族主義考量，最終決定以發展核武作為最高優先項目⁹⁸。

這樣的科技民族主義也反映在海軍的建設上，蕭勁光的第二本回憶錄，便敘述了海軍計畫從學習、仿製到自行製造的政策設計與規劃。對於所有重要的科技，都力求能夠掌握在自己手裡⁹⁹；其中，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 1959 年對於中共提出希望蘇聯能幫助研製核潛艇表示：「核技術非常複雜，花錢很多，你們中國沒有水準也沒有能力研製，我們蘇聯有了，就等於中國有了。你們把海

軍基地給我們用，我們的核潛艇可以幫助你們」¹⁰⁰。毛澤東對此非常氣憤，強調「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¹⁰¹」1960 年 8 月蘇聯前來協助的專家與技術人員被召回蘇聯之後，中共所採取的「自立更生」政策，更彰顯出北京「科技民族主義」的特色。可見在武器科技方面，中共不僅強調科技民族主義，同時也對於能夠彰顯其民族主義大國情緒的武器載台，包括戰略核潛艇在內投入相當龐大的人物力資源。

二、強調中共民族主義的地位

誠如日本拓殖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學部教授茅原郁生對日本媒體指出，中國面對「統一台灣」和「少數民族分離運動」的問題，對缺乏領袖魅力的中國高層，如何掌握人心是個大問題，過去動不動把台灣或日本塑造成敵人來提高向心力¹⁰²，現在則更進一步企圖藉著中共政權在提振民族自豪感方面的成就，鞏固其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掩飾中共

註⁹⁷ 摘自朱增泉，「王永志：中國載人航太從追趕開始並未抄襲他國」，人民日報，2003 年 10 月 17 日，版 3。

註⁹⁸ 參閱 Evan 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48.

註⁹⁹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年）頁 77-88。

註¹⁰⁰ 「二十世紀最具震撼力的 10 句話！」，台州職業技術學校，2007 年 5 月 12 日，網址：<http://tzvtc.com/skb/show.asp?cid=12&id=329>

註¹⁰¹ 「特稿：龍嘯九天——中國核潛艇專家採訪錄」，新浪軍事，2005 年 4 月 6 日，網址：<http://jczs.sina.com.cn/2005-04-06/1045278804.html>

註¹⁰² 「日軍事評論家：中國太空技術增加對台威脅對日衝擊」，東森新聞台，2003 年 10 月 16 日 14:41，網址：<http://member.ettoday.com/trnsearchdb.php?s=1&p=%A4%E9%AD%78%A8%C6%B5%FB%BD%D7%AE%61&i=1528960>。

偏離馬、列、毛意識型態卻又拙於自圓其說的困境¹⁰³。中共認為 1949 年奪取政權之後，可說是中國的政治崛起；1990 年代以後，北京政府甚至在文化與歷史領域推動民族主義，並且進行官修古史，藉以證明「中華民族」的悠久偉大，而中共政權則成為開創民族第四次崛起的必要條件。

中共充分瞭解中國近代淪為次殖民地的悲哀命運，民族自信全然喪失；對此，中國歷任政府莫不利用反外情緒與受害者意識作為維護正統的手法，中國共產黨同時也強調「國恥教育」，煽動仇外意識¹⁰⁴。在有關抗戰勝利 50 週年的紀念活動中，新華社所轄《瞭望》週刊一篇名為〈七七事變紀念日的一種思考〉文章中指出，「若沒有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團結全國人民，奮起反擊，後果將不堪設想。¹⁰⁵」甚至中國不僅自認為是 20 世紀世界革命的中流砥柱，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外，也在爭取民族獨立解放鬥爭中，做出傑出的貢獻¹⁰⁶。

在經濟發展方面，由於其成就驚人的迅速發展，使得中國受到國際社會關注，並且有助於其國際威信的提高。而國際威信的提高，反過來喚起人民「愛國主義」意識¹⁰⁷。特別是當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乙事，愛國主義再次高漲。人民日報在 1997 年 7 月 1 日社論甚至宣布「洗去了中華民族百年的恥辱」；至於導彈、核彈與衛星儘管耗費巨大社會資源，甚至是延緩民生發展水準，但卻是激發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鞏固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¹⁰⁸，使中國不但能夠擺脫過去歷史的傷痛¹⁰⁹；更有甚者，能以發展中國家之身分挺進「宇航三強」，收到類似三峽大壩完工、北京成功申辦奧運那樣的振奮人心、激發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更進一步顯示出中共在恢復民族自信心的重要貢獻，有利於持續掌握大陸政權。《科技日報》的一篇文章甚至表示，當年中國在蘇聯的取消援助與美國的圍堵與扼制的情勢下，靠著自己的心血努力，僅用四年的時間便研製出原子彈，並且

註¹⁰³ 石之瑜、姚源明，「中國民族主義的後現代機緣：國家遷徙歷程中的集體疏離與個體能動」，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2 年 5、6 月，頁 88-9。

註¹⁰⁴ Nicholas D. Kristof, Sheryl WuDunn, 林添貴譯，東方驚雷（Thunder from the East）（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305。

註¹⁰⁵ 轉引自高井潔司，楊鴻儒譯，中國真相：解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台北：新中原出版社，1997 年）頁 82-3。

註¹⁰⁶ 陳明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2。

註¹⁰⁷ 小島朋之，翁家慧譯，「中國」現代史：中共建政五十年的驗證與展望（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頁 94。

註¹⁰⁸ 盧德允，「觀察站出長城上太空 神舟搶占新高地」，聯合報，2003 年 10 月 16 日，版 2。

註¹⁰⁹ 文波聞刀，「太空俱樂部裏的新成員：中國低調躋身宇航三強」，中新社，2003 年 10 月 15 日電；林弘展，「神舟與魚雷」，中時晚報，2003 年 10 月 16 日，版 15。

僅耗用相當於蘇美英法等強權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時間；此後，研製成功氫彈和人造衛星。所以，「兩彈一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神舟則是「偉大民族復興的實現」^⑩。

三、防範各項顛覆活動方面

北京不僅期望藉著各項政治、經濟成就來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維持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同時也注重在各個層面打擊各種可能導致滋生不滿情緒、衍發動亂進而威脅經濟與政治穩定與政權地位的根苗，達到防患未然之效。對此，北京提出「統一的國家是強大的前提」這樣倒果為因的說法，作為民族主義的精神號召。因為根據歷史實際經驗，統一是國家強大之後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強將統一當作國家強盛的前提條件，並在必要時動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如此過於強調武力顯然違背「來遠人」的文化吸引能力；同時將統一當作強大的前提也增加時間的緊迫感，更容易激起關係緊張與反彈，不如將之視為後果那樣有耐性。所以常有媒體或作家傳出中共統一（或攻台）時間表的消息，並不值得意外，特別是在民族主義情緒的感染與要求下更是如此。

在對內維持大一統局面方面，中國藉著

自身力量或聯合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達到其防範因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與不同習俗所導致的社會動亂與政治分裂。中國支持美國反恐，與創立上海合作組織的目的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打擊東突等恐怖組織等「三合一」敵人。中國與俄羅斯所進行的聯合演習，也是針對反恐而來，但兼顧對台灣欲走向獨立的威懾。對於上述地區或組織的分離意識及活動，北京定義為歷史與民族罪人，以求凝聚愛國主義共識。

國內學者趙建民指出，隨著對內新保守主義的當道，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則表現出相當排外的民族主義傾向。這種排外民族主義具有下列特質^⑪：（一）強烈反美與「中國威脅論」的認知；（二）對台獨分裂的擴大解釋；（三）擴張式的外交政策，在民族主義考量下，保衛國土完整與安全和成為世界尊敬的強盛民族，是北京在維護政權合法性所必須達到的目標^⑫。在這樣的情況下，解放軍負有兩項主要任務，首先必須統一兩岸，因為對北京而言，兩岸若不統一，國土便不完整，國家不僅無由強盛，甚至還面對更嚴峻的國土分裂危機；其次，解放軍必須維持國土完整，維持所控制邊界的安定。就此而言，維持現狀並不足以徹底達成目標，必須擴大防禦縱

註⑩ 青山，「神舟禮讚」，科技日報，1999年12月6日，版2；「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對我國載人航太工程第一次飛行試驗成功的賀電」，新華社，99年11月21日電。

註⑪ 趙建民，「台灣主體意識與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對抗：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41卷第1期，1998年1月，頁62。

註⑫ Michael Oksenberg, "China's Confiden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no.65, Winter 1987, pp.501-23;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China Quarterly, no.142, June 1995, pp.295-316.

深，建立緩衝區^⑬。在海洋方面，中國則將其所宣稱的領海主權，稱之為「海洋國土」，期望藉此激發人民將 3 百萬平方公里的海洋，與內陸的國土意識連結起來，形成在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共識，做為海軍發展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來源憑藉。中國自古以來對亞洲、非洲的天朝階級意識與種族中心意識，將使得歧視外國人，特別是亞洲人與黑人^⑭，將令情況更加不容樂觀。

無論如何，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戰略思想，為共軍履行新的歷史使命、切實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和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了根本方略，同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二途徑^⑮。因此 21 世紀頭 20 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之不易的歷史機遇期。維護好國家重要戰略機遇期，確保長期安全穩定的內外環境，是共軍新世紀新階段神聖使命所繫、光榮職責所在。面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中國形成的政治、軍事壓力，面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給中國安全環境帶來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面對台獨分裂勢力猖獗活動對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根本利益的嚴重威

脅^⑯。做好新時期軍事鬥爭準備，乘勢而上完成共軍機械化、信息化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在新世紀的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⑰。

結 語

探討中國軍事變革的內在環境因素，在內部環境因素方面，涵蓋了意識型態、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情緒等三大類政權合法性支柱。一般來說，在有關中共政權及其軍隊的合法性來源的探討，主要在於馬列主義意識型態。同時認為，當意識型態不足以穩固中共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時，北京開始將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情緒，作為政權合法性來源的補充。然而，從大陸意識型態的生成發展歷史過程中，可以看出打從五四運動起，馬列主義之所以興起，並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本身就含有相當濃厚的「富國強兵」的經濟與民族主義色彩。更何況，馬克思主義的重心就在經濟決定論，以及打破不平等的經濟壓迫（生產關係）。毛澤東則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加上了民族主義因素。可以說，在大陸，意識型態的形成與發展，自

註⑬ Nan Li, "PL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in Stephen J. Flanagan and Michael E. Marti,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3)p.70.

註⑭ Nicholas D. Kristof, Sheryl WuDunn, 陳妙香譯，驚蟄·中國(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台北：智庫文化出版社，1996 年）頁 41。

註⑮ 張文木，「制海權是國家興衰關鍵，中國必須走向海洋」，新華網，2007 年 1 月 15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1/15/content_5606886.htm

註⑯ 解正軒，「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解放軍報，2005-04-26，版 2、7。

註⑰ 李選清、柴永忠、包國俊「直面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疾風驟雨—與軍事科學院部分專家學者對話錄」，解放軍報，2004 年 6 月 6 日，版 8。

始至終都是主義、經濟與民族主義「三位一體」。不僅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都是某種意識型態的表現，甚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環境發展，產生所謂「經濟民族主義」的現象¹⁸。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於中共建立政權的前面 30 年，以意識型態作為標準對經濟與民族主義進行畫線。之後則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建設目標下，以更加理性務實的態度追求經濟發展並滿足民族主義情緒，並以「實事求是」做為意識型態的核心價值，來達到自圓其說目的。畢竟，前兩者才是政權合法性的實際根源，而意識型態在當初只是有利於中共達成上述兩者的「工具」罷了。由此，不難理解，中國大陸在隨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情緒也日益高漲，但意識型態卻相對落後與下跌的情況。不過，因此而低估現今意識型態對於政權合法性、正當性的作用，也會陷入矯枉過正之弊。從鄧小平到第四代的胡溫班子，任何違背意識型態的政策措施，都引發內部激烈的爭論。

經過數十年的思想教育，軍隊儘管必須服從黨的總方針、總路線，但仍屬於保守左派的組織。因此，在改革初期對於北京政權的經改政策抱持抵制態度，直到楊家將喊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口號之後，再加上軍隊逐漸從原本的經改受害者，轉變為經商獲利的厲害關係者，才逐漸改變觀念，服從「經濟建設大局」。不過，有別於其他政治與社會機構，解放軍的意識型態除了對世界、

歷史與人類發展的趨向等信念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化」過程中，對於「黨指揮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納入意識型態要項之中。因此，意識型態在政權合法比重上，仍然相當重要。畢竟，黨指揮槍與毛的軍事思想，都是解放軍克敵致勝的法寶。

然而，在政權與軍隊的合法性來源中的經濟與意識型態脫鉤，使得北京能夠更加理性推動政策，而不再懷著浪漫情懷。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服從經濟建設大局，中共軍隊在國家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前提下，不僅不再盲目支持其他國家毛派游擊隊以及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不量力而為的援助外，軍隊也從過去的臨戰狀態，轉為和平建軍時期，減少軍費開支，以集中力量發展經濟與科技。有時，經濟發展為主軸的政權合法性來源，甚至會損傷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這一點，從中共軍方將領多次請戰，要以強硬態度解決包括台灣、南沙與釣魚台主權紛爭，並對美國的挑釁來個「硬碰硬」，都顯示出共軍在經濟和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之間發生矛盾時的挫折感。

所以，目前政權與軍隊的合法性來源，可以看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判準的「新三位一體」。這種情況與 Michael D. Swaine 所論的「深思熟慮戰略」內涵若符合。在這樣的情形下，意識型態與民族主義儘管仍然在合法性方面佔有重要地位，但卻必須「服從經濟建設大局」。因此，在不嚴重挑戰意識型

註¹⁸ 參見徐煜、詹曉燕，「世界當代史中的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義運動」，咸寧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05 年 8 月，頁 70-2。

態與民族主義核心價值的情況下，處於社會發展初期階段的中國，為形成有助於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必須採取防禦態勢的國防政策，並且宣示即使將來強大了，也決不走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¹⁹。當然，為了以經濟發展為重心的合法性緣故而保持「防禦」與「和平」性質，也會為了利益衝突而不惜展示武力，進行砲艦外交，甚至透過軍演恫嚇與發動戰爭。

Evan A. Feigenbaum 指出，僅從中共動武例證進行探討，最終並不能說明什麼²⁰。然與中共合法性來源衝突，越向上發展共軍態度便會越強硬，特別是在沒有其他替代手段解決經濟利益紛爭時，爆發戰爭機率最高。與中國政權合法性來源衝突越低，也就是箭頭越往下，引發衝突的機率也隨之降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有時會引發危機或透過戰爭手段，鞏固國內政治地位，動員民眾支持其政權，以維持其政權合法性²¹。此外，除了有利於理解戰爭機率外，也有助於認識隨之而來的軍隊發展重點。因為戰爭機率的增加方向，意味著軍隊應付戰爭重點，因此在軍隊發展項目上，越朝箭頭上方就越受到

重視，因而越有機會獲得更多有限資源；越朝下則越不重視，甚至遭到邊緣化對待。對此，濱海與海洋將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飛騰提供豐富的物質基礎，是通向可持續的重要基地情況下²²。特別就目前與可見的未來，東南沿海由於不僅如同 David Finkelstein 所認為在經濟發展與民族自豪感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²³，事實上也是意識型態對於生產力要求的核心地帶，這不僅使得中國國家重心，連帶也讓東南沿海所面臨的威脅，成為理解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大環境。

未來在石油運輸安全對中國經濟發展佔有越來越關鍵地位的同時，中國是否持續經濟發展，並將中東至東南沿海一線，以及大陸至美洲西太平洋一線視為國家命脈交通線，值得持續觀察。屆時，亦將是理解共軍現代化發展方向的重要線索。

作者簡介

王瑋琦女士，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國防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副教授、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院長，現任職樹德科技大學副教授。

註¹⁹ 中國國務院，「中國的國防」，新華網，1998 年 7 月，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690.htm

註²⁰ Evan A. Feigenbaum, "China Military Posture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politics," *Survival*, vol. no.2, Summer 1999, pp. 76.

註²¹ Mark Burles, Abram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RAND, 2000)p.17.

註²² 張澤南、張璐，海疆縱覽：中國海域地理變遷和資源開發（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 年）頁 28。

註²³ Benjamin A. Shobert, "US Puzzles over China's Military Might," *Asia Times*, Feb. 9, 2007, website: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IB09ad01.html>